

漢文

演义

呂浩○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教材建设专项经费资助

SHUO WEN YAN YI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最经典著作之一。《说文·叙》涉及诸多文字学理论，正文涉及汉字形音义关系、汉字流变、文献用字以及语言学领域的其他概念。我们一方面充分疏理了《说文·叙》，另一方面探讨了《说文》正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并档逻辑关系排演了U+D个汉字部首。同时，以专题为主线，把《说文》中所反映的问题推演开，展开深入讨论，因化名之曰“演变”。其中形声、转注、奇字等简题的讨论具有创新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文演义/吕浩著.—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 - 7 - 81118 - 434 - 1

I. 说… II. 吕… III. ①汉字—古文字学②说文解字—研究 IV. H1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5933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封面设计 朱静蔚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说文演义

吕浩 著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o.com> 发行热线 66135110)

出版人：姚铁军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4 字数 235 000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100 册

ISBN 978 - 7 - 81118 - 434 - 1/H · 185 定价：22.00 元

内 容 提 要

《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最经典著作之一。《说文·叙》涉及诸多文字学理论，正文涉及汉字形音义关系、汉字流变、文献用字以及语言学领域的其他概念。在本书中，我们一方面充分疏理了《说文·叙》，另一方面通过专题探讨了《说文》正文所涉及的几个问题。另外，本书第二章就逻辑关系排演了540部首，并就部分部首字条做了说解。就专题而言，本书涉及字形与字体，训诂方法与形式，六书与奇字，一曰与读若等等。我们以这些专题为主线，把《说文》中所反映的一些问题推演开，展开深入讨论，因此名之曰演义。本书中形声、转注、奇字等问题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且，蘇賀縣珠皆華胥也，外交與惠字不一而辭奉主泊則子
赤縣。相傳仰鑿天子山并株東南五嶽皆黑而白以火加
飞燭，《易平康首》辭表聞，《鑿竹詩題作》山幽林，《告辭賦
玉公》平采帝即子主廟軒。丘善等《御誥詩題長》祖大鵠，《乘風賦題詩》丘

十山書事，時丘（平治）子丘（永公）味實魯迷于草，陳文（平
常）之塗，字輔文號《裝姬賦題詩主唱》。曹叔庸水明山人所著
曰，“蘇鑿學衡山”“勸耕土號”。文成縣表率于漢望嚴顯，海歸土人以十
丘山為名。表率中史卿从之始率，傳其姓。羊立縣都真通魯修耕表
香草，西秦固南都操大卦，陝京人賦。本玉斐十二岁血獻孝率縣长，至三
春《御誥長》貴遠敬奉劉豐卿大學致於文古今無缺。平昌（永公）平不味
牛多文古堂，劉賈从耕斯社。《耕子》歌《耕尚》，方古《耕樂公》，《耕乃生林
第卦文，十首達五家詩。齊殊聖宋已參附詩。《平治》子公，平四歲水帝安
公，平五歲多雨安。詩詩未與國同，是聖和。《平治》永公，平六歲水帝安安。

，升亭《文賦》帷簡平始。平確文指《曉鼓曉鐘中詩子集》。《平治》子
人最通政體極熟，“蘇鑿學衡山”“勸耕”表叔基通如歌的耕斯耕
知耕如歌為。其刻數未丁巳春书。同耕致五好黃麻氣白春露齒土種城草
子之將鑿卷。《少昇鑿王》休授王任耕的耕作。七耕文古堂，劉賈从耕品
，表率吉諱者，方古賢余其一《文賦》歌。李《文賦》五子南移以耕文

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

东汉光武末年，许慎被策举为郎官，改工部典农郎从事。因避恭帝李渊
之难，弃官归家。建武初年，许慎被召入京，授郎中，转郎中，再转郎中，后
又除郎中，再转郎中。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
常推敬之，时人为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除郎中。再
辟太尉府，再辟司隶校尉，再辟司隶校尉。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
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后汉书》中郑玄、马融等人有独立的传记，而许慎的传记就只用这么寥寥几句，范晔的取舍实在令人难以琢磨。东汉时的汝南郡（今河南召陵今为河南郾城县东（现属漯河市），洨长即洨县长（人口多的县称县令，少的称县长），洨县在今安徽灵璧县南五十里）。范晔《后汉书》中



的这段话对于许慎的生卒情况一个字也没交代，后世学者根据贾逵、马融、许冲等人事迹以及白虎观讲议五经的史料作出了大致的推断。据清儒严可均《许君事迹考》、林颐山《许慎传补遗》、陶方琦《许君年表》、诸可宝《许君疑年录》、钱大昕《许慎传漏略》等考证，许慎生于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之初，卒于桓帝建和（公元147—149年）之初，享年九十。

许慎初入仕途即为郡功曹，即主管记述功劳。《说文解字·叙》：“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加上许慎“少博学经籍”，可知许慎为郡功曹应在弱冠之年。按汉制，孝廉多从郡吏中推举才德出众之士，许慎举孝廉应是二十岁左右，随入京师，任太尉府南阁祭酒。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精通今古文的经学大师贾逵奉诏在黄门署讲授《春秋左氏传》、《谷梁传》、古文《尚书》和《毛诗》，许慎师从贾逵，受古文之学。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许慎参与东观校书，校定五经、诸子、史传等。汉安帝永初六年（公元112年），除洨长，但因病未赴任。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派子许冲向朝廷献《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等书。

许慎的治学成功的基础是“性淳笃，少博学经籍”，成功的机遇是入京后赶上诸儒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并参与了东观校书。成功的保证是师从贾逵，受古文经学。许慎的著述主要有《五经异义》、《孝经孔氏古文说》、《淮南子注》、《说文》等。除《说文》外，其余皆亡佚，清儒有辑录。

儒家学派经历了秦朝的灾难之后，在汉武帝时代迎来了无上的荣耀，过去靠口耳相传的儒家经典这时开始用隶书写就，这些经典称为“今文经”。汉武帝开设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儒学昌盛起来。许慎本是今文经学家，时称“五经无双”。今文经学家说经重点在于微言大义，试图阐明六经中所蕴含的孔子的政治思想，其结果流于琐碎繁杂，一部经书往往会有上百万字的章句，《汉书·儒林传》说秦延君解释《尚书》的“尧典”二字就用了十万多字。今文经学家还以阴阳五行说附会经义，为随后的谶纬之学开了先河。

汉代古文经学的产生源于古文经典的发现。《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河间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汉武帝末年，鲁恭王毁孔子宅，从墙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书。古文经发现以后，一些经学家开始研究这些古文经典。两汉的古文经学家



主要有张敞、桑钦、刘歆、杜林、卫宏、服虔、徐巡、贾逵、郑众、马融、郑玄、许慎等人，他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解字说经，重视名物训诂，形成了儒学的朴素治学风气。

许慎《说文》就是在两汉今、古文经争论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今文经当时是官学，今文经学家排斥古文经，说古文经学家“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所谓“古文”根本不存在，“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于是今文经儒生据隶书解经，以至于出现了“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这类说法，其穿凿可以想见。

东汉时，经今、古文之争有了转变，汉章帝建初四年诏令儒生在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许慎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师从贾逵研习古文经，他对于今文经学派一些俗儒随意说解文字的做法深恶痛绝，痛斥那些“俗儒鄙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覩字例之条，怪旧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习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的鄙陋浮夸的学风，是他们“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许慎认为文字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是“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根据。他认为要恢复文字的正确运用，就要清理古籀小篆的字形结构与音义关系，从文字出发，旁及经传，以达到“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的目的。

三

《后汉书·儒林传》说许慎作《说文》十四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慎子冲乃合十四篇及《叙》称十五篇以献。”可知，《说文》十五篇（卷）包括前后叙及540部首部目在内。徐铉等校定时分成了三十卷，分卷原则上把原十四篇分为上下卷，每卷字头数相对平衡。许书每篇收字情况详见下表。

篇 次	部首数	字头数	重文数	收字合计
1	14	672	81	753
2	30	693	88	781
3	53	630	145	775
4	45	748	112	850
5	62	527	122	649



续 表

篇 次	部首数	字头数	重文数	收字合计
6	25	753	61	814
7	56	714	115	829
8	37	611	63	674
9	46	496	63	559
10	40	810	87	897
11	21	685	62	747
12	36	779	84	863
13	23	699	123	822
14	51	630	74	704

在结构上,大徐本每卷之首先标明该卷序数,接着是“汉太尉祭酒许慎记”、“宋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校定”字样标明作者和校定者,然后依次是该卷所含部首数、字头数、重文数、总收字数、新附字数。每部正文之后往往还有字数标识,也有个别漏略的,如《永部》后脱“文二”字样。

关于重文问题,《说文》各传本略有差异,以《玉部》为例,大徐本 17 个重文,小徐本 15 个,段注本 17 个,桂馥本 16 个,王筠本 16 个。全书收重文数,段注本 1 280 个,其他本 1 279 个。与《说文·叙》说的 1 163 个重文有所不同,可见大徐本中也有后世增入的重文。当然,大徐本还新收录了一些字头,称为《新附字》,共 402 个,分别附在相应的部末。这些新附字,有的是《说文》漏略的,有的当时已有的“时俗要用”之字。

《说文》“据形系联”,分为 540 部,始一终亥,“不相杂厕”。实际分部中不仅仅据形系联,形义关系是分部时充分考虑了的。如“玆”字可入《玉部》,但“班”、“班”二字义从“玆”出,故设《玆部》。其他如《口部》、《品部》、《𠂔部》、《誼部》、《效部》、《眴部》、《葬部》、《林部》、《宫部》、《多部》、《句部》、《麤部》、《炎部》、《辯部》、《𧈧部》等等单独设部,显然已经超出了据形系联的范畴。许书各部先后次第,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有说,但多穿凿。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亦有申述,可参阅。

《说文》收正字 9 353 个,重文 1 163 个,解说凡 133 411 字。全书分为十四卷,连同叙目共十五卷。宋人徐铉在校定时,嫌篇帙繁重而将每卷分成上下两卷。

按照《叙》“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的说法，《说文》收字对象应是篆文、古文和籀文三类。但正文中往往还有其他类别的字，如奇字、或体、俗字、秦刻石用字、群书用字等。

金，奇字仓。人，仁人也。古文奇字人也。象形。儿，从子，奇字涿，从日乙。无，奇字無。通於元者。古，从口，奇字𠂔，盛兒。从弄从日。讀若薿薿。一曰若存。晉，籀文晉，从二子。一曰晉即奇字晉。或体如：

秦刻石用字如：
“廿四‘十六’歲封禪泰山，立石於泰山之南，刻石其上，文曰
‘濟，秦刻石繹山文攸字如此。’

芑，秦刻石也字。
群书用字如：
𧔗，《夏書》玭从虫、賓。
眡，祕書眡从戌。
𦥑，墨翟书𦥑从弗。

四

关于《说文解字》的价值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文化价值，二是学术价值。

首先说《说文解字》的文化价值。

许慎在解释字义时引用了大量的先秦典籍中的资料，其中引经多达1083条。另外，对于《老子》、《墨子》、《韩非子》、《楚辞》等也多有引录。与此同时，许慎还博采通人，大量引用了汉代董仲舒、司马相如、房京、刘向、刘歆、杜林、贾逵、杨雄、班固等多位经学大师的观点及部分方言俗语。因此，《说文》中保存的这些语料对于考察先秦的词义，了解汉代的训诂和方言都是十分宝贵的。

《说文》是一部反映古代文化的百科全书。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通过《说文》，我们可以了解到古代社会的典章制度、生产状况、文化科学、地理沿革、风物习俗等等。

再说《说文解字》的学术价值。

首先，《说文》确立了汉文字学的基础理论——“六书”理论。“六书”虽不始于《说文》，但一直到《说文》才有了“六书”完整的定义和例子（尽管定义过简，例子有的不够准确）。《说文·叙》：“《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历来研究“六书”必以许慎定义为主臬，且汉字研究离不开“六书”。尽管随着古文字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三书”^①、“四书”^②、“五书”^③、“七书”^④、“八书”^⑤等学说，但仍是“六书”的某种“修正”，即便是汉字构形学的汉字结构分析法也是难以摆脱传统“六书”理论。

① 最早提出“三书说”的是唐兰，他在1934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中把汉字结构分为象形、象意、形声“三书”，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中进一步阐发了“三书”理论：“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之后，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的“文字”一章里，提出了新的“三书”说：象形、假借、形声。1988年裘锡圭出版《文字学概要》，在唐兰“三书”说的基础上，借鉴了陈梦家把假借纳入“三书”的观点，又把唐兰的象形与象意合并为表意，从而形成新的“三书”：表意、形声、假借。

② 2001年，张玉金《汉字学概论》把造字法与结构类型区分开。在结构类型上，把汉字分为意符字、音符字、意音字、意音记字、半记号字、记号字等六种；在造字法上，分为表义法、表音法、音义法、记号法等“四书”。

③ 1988年，王元鹿《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把“六书”中的“转注”排除在造字法之外，还剩下“五书”。

④ 1989年，王凤阳《汉字学》认为造字法实际有象物、象事、象意、标示、形声、会意、假借“七书”。

⑤ 1985年，任学良《说文解字引论》承袭传统把“六书”看成造字法的观念，又把“比喻造字法”、“综合造字法”一并纳入造字法系统，从而形成“八书”说。

其次,《说文》创立了部首归字法,根据汉字形义关系,归纳出 540 个部首,部首的排序也有较强的体系性。后世字书如晋吕忱《字林》、南梁顾野王《玉篇》皆基本遵循《说文》部首系统。后世研究《说文》部首的学者多认为《说文》540 部中不少部目可以删减归并,但《说文》部首不仅仅是“据形系联”,意义也是确立部首的一个因素,因而 540 部自有其内在系统性。

再次,《说文》保留了大量的古音资料。明显的资料是《说文》中有不少声训、“读若”注音以及直音注音,这些材料为汉语上古音研究提供了便利。《说文》所收的大量的形声字也是研究古音的重要材料。《说文》中收录的重文(古文、籀文、或体、俗字等)对古音研究也至关重要。

再次,《说文》运用多种训诂方法:形训、声训、义训,表现为多种训诂形式:同训、递训、互训、反训,贮存了丰富的意义体系,对于考察字际关系、词际关系、字与词的问题等具有不可多得的意义。

最后,《说文》的学术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字书编撰得以取材,而且文献校勘得以为据,读书解经得以为法,著书立说得以引证。

当然,《说文》也有自身的局限,释义中有时存在阴阳五行、神权、君权思想,字形分析也是偶有错误之处,虽然他反对今文经学者的“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的分析汉字方法,但《说文》中也有“天屈西北为无”、“一贯三为王”等类似解法。

目 录

801	解卦
871	解卦
101	解卦
903	解卦
008	解卦
015	解卦
绪 论 许慎和他的《说文解字》	1
第一章	前叙文字学之端绪
	后叙部首学之滥觞
第二章	五百四创部首之源
	九千三究汉字之本
第三章	论字体 古文籀文篆文奇字六体该备
	说字形 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六书齐全
第四章	同训递训互训形式多样
	形训声训义训方法灵活
第五章	指事象形皆为文难分先后
	会意形声都是字也会交融
第六章	转注关意关形总可类聚
	假借同声同形应作两文

說文解義

目
录

1





第七章	形义声音好像分工明确 声形交关本是相辅相成	163
第八章	书奇字奇奇字不在六书 好奇猎奇奇字已出数篇	179
第九章	守本训明字形不忘音义 设一曰说形音释义分歧	194
第十章	阙如阙的是字形音义有不知 读若读的是字音义形所需明	200
主要参考文献		209
后记		210

卷一：《說文》的古形與聲

卷二：《說文》的古義與說

卷三：《說文》的古音與讀

卷四：《說文》的古訓與解

卷五：《說文》的古義與說

卷六：《說文》的古音與讀

卷七：《說文》的古訓與解





第一章 前叙文字学之端绪 后叙部首学之滥觞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①，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③。黄帝之史仓颉，见鸟

^① 庖羲氏，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制作八卦，教民结网捕鱼。有的文献记为“伏羲”、“伏犧”，传说为人首龙身。伏羲与女娲的传说较早始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如《周易·系辞下传》、《庄子》、《荀子》、《楚辞·大招》、《战国策·赵策》等。

② 象，天象，法，与天象对举，指物象。文，今字作纹。宜，《尔雅·释诂》：“宜，事也。”垂，《说文》解释“示”字说：“天垂象，见吉凶。”明示的意思。宪象，与象、法相对而言，是指抽象了的物象。“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几句话说到作“八卦”的根据。《周易·说卦传》八章：“《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周易·说卦传》九章：“《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唐孔颖达《正义》曰：“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者，言取大象也。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者，言取象细也。大之于细，则无所不包也。……近取诸身者，若耳目鼻口之类是也。远取诸物者，若雷风山泽之类是也。举远近则万物在其中矣。”上述几句话也被看作是汉字发生的依据，“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尤其被看作属于造字取象范畴。正因为如此，《八卦》也就被看成是汉字的起源。另外，《周易·系辞下》第二章：“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与此处文辞稍异。康有为认为《系辞》为孔门弟子所作。郭沫若《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时代》指出：“殷周典籍以及古器物文字，如卜辞与金文之类，丝毫也没有表现着八卦的气味。八卦的卦形最好拿来做图案，但是青铜器的图像中尽管有不少神秘的花样，而却没有一件是利用到八卦上来的。”他的结论是：“八卦是既成文字的诱导物，而其构成时期亦不得在春秋以前。”

③ 神农氏，《孟子》赵岐注曰：“神农，三皇之君。炎帝，神农氏也。”结绳，远古记事方法。《老子》第八十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车，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庄子·胠箧》：“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班吉庆在《汉字学纲要》一书中说：“根据许多外国古代记载和近代的人类学、民俗学所提供的资料，世界上许多民族在没有文字以前都曾经过一个用实物帮助记忆的阶段，人们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使用过种种方法，有结绳、编贝、刻木、刻石、刻骨、堆土、堆石等等，结绳则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法。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记事。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等也都流行过结绳记事。”（转下页）

兽蹠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书契^①。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②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③。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④。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⑤。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

(接上页)李学勤在《古文字学初阶》一书中说：“结绳是一种原始的记事方法，有大事就在绳上结大结，有小事就在绳上结小结。这种方法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曾使用。如广西的瑶族遇到双方说理，各用一绳，说出一个道理打一个结，谁的结多便能取胜。西藏的僥人邀集宴会，向亲友送绳，以绳上的结数表示宴会将在几天后举行。有的少数民族的结绳比较复杂，也用绳结的大小来区别所代表的不同事物。古人的结绳，和少数民族用过的方法应该是类似的，后来才被‘书契’即文字代替了。”《周易·系辞下传》：“上古结绳而治。”郑玄注：“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为治也。”绳节的大小和多少大致标明事情的大小和多少，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模糊性，容易产生伪诈之事。这里说的是结绳记事的局限性。“庶业其繁”的“其”同纂，意同极。“萌生”，段注“谓多也”。

① 仓颉，又作苍颉，传说为黄帝时候的史官。《韩非子·五蠹》：“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背厶谓之公。”《世本·作篇》：“史皇作图，苍颉作书。”《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諸书讲到苍颉造字问题，但苍颉的身世实际上不甚明朗。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一中说：“其苍颉则说者不同。故《世本》云：‘苍颉作书。’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玄皆云：‘苍颉，黄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云：‘在炎帝之世。’卫氏云：‘当在庖牺苍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牺之前。’张揖云：‘苍颉为帝王，生于禅通之纪。’……如据此言，则苍颉在获麟前二十七万六千余年，是说苍颉，其年代莫能有定！”蹠，即蹄字。迹，兽迹。鸟曰迹，兽曰蹠。书契，据苍颉造字的说法指文字。但“见鸟兽蹠迹之迹”能造出多少文字来呢？上古时代，巫、吏、史不分家，他们是少数掌握和使用文字的人，传说苍颉是史官也就不足为奇了。苍颉造字虽不足信，但已经涉及汉字起源的问题，这里不作讨论。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谓“书契，犹今言写刻……书谓写物象于器，契谓刻木识数”。郑玄注《周易》云：“书之于木，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合，若结绳之为治。”书契类似战国时候的券契。此处书契又似乎指文字一类的东西。

② 乂，《尔雅·释诂》：“乂，治也。”与上文“结绳为治”的“治”同义。《夬》，卦名，象征决断。《周易·系辞下传》：“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与此处文辞稍异。《夬》：“扬于王庭”为《周易·夬》卦辞。

③ “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这一句是对《夬》卦“扬于王庭”的解释。“言”，王筠《说文句读》谓“推孔子之意如此也”。《周易·夬·象》：“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施禄及下，谓能文者则禄加之。居德则忌，谓律己则贵德不贵文也。”《夬》卦“泽于天”，君子施禄于下，不居功德。《老子》所谓“功成而弗居”。

④ 许慎这里区分文和字两个概念，他认为“文”是以类象形而产生的，后世学者概括为独体字。“字”是“形声相益”而产生的，是由“文”“孳乳而浸多”的，后世学者概括为合体字。“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这段话似乎不够工整，一本“故谓之文”后还有“文者，物象之本”一句。“文”之于“本”、“字”之于“孳”都是声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析言之，独体曰文，合体曰字；统言之，则文字可互称。《左传》‘止戈’‘皿虫’，皆曰文，是合体为文也。许君某部言文若干，谓篆文。言凡若干字，谓说解语。是则古篆通谓之文，已语则兼言字也。”顾炎武《日知录》谓“春秋以上，言文不言字”(《左传》中的“字”字皆训为“乳”)。许慎以前似没有文与字的区分，因而“合体为文”、“篆文为文”的说法不足论。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曰：“指事、象形、会意三书，实皆属于形系；形声、转注、假借三书，则属于声系。形系者，即此所谓以类象形谓之文；声系者，即此所谓形声相益之字。”马叙伦以“形系”“声系”二分，随着“转注”一书的不确定而难以定论。

⑤ “书者如也”为声训，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如其事物之状”。能“如其事物之状”者，唯有象形字而已。“著于竹帛”者显然不止象形字。这里是指“如”各自的字体而已。



有同焉^①。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②：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③。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④。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⑤。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誼，以见指撝，武信是也^⑥。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⑦。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聲以託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六書皆是也。

① 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在泰山封禅的七十二代，所刻文字字体没有相同的。此处讲到历代文字异形问题。“改易殊体”犹言因改变而成异体。

② 《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小学”名称初见《大戴礼记》，《保傅篇》：“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学者所学之官也。”可见，“小学”原本是学校的一种。保氏，教育官。国子，公卿大夫子弟。“六书”名称最早见于《周礼》，但只是总名，具体名称最早见于刘歆《七略》（见于班固《汉书·艺文志》），其后郑众注《周礼》亦有“六书”具体名称。再后就是许慎《说文解字·叙》，不但有名称，而且有定义和例子。在汉语言学史上，论及“六书”者可谓汗牛充栋，详见本书有关章节。也有人认为《周礼》的“六书”是干支纪年方面的名称，如张政烺。

③ 指事，班固《汉书·艺文志》引刘歆《七略》作“象事”，郑众注《周礼》作“处事”。“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两句，段玉裁注本改作“视而可识，察而见意”，理由是“以下每书二句皆韵语”。许慎这里首言“指事”一书，后世多不取。如金匱《说文约言》谓“六书次第，古今论者数十家，分歧不一。然证之近日环海各国之文字，无不以象形字为最古，是以象形居六书之首，当无疑义”。马叙伦《说文解字六书疏证》更是用不少篇幅证明“指事必生于象形之后”。一般认为，指事分为两类：一类为纯粹指事符号，如一、二、上、下等；另一类为象形字的基础上加指事符号，如本、末、刀、亦等。因而辨明指事与象形的先后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④ 画出事物的形状，随着事物形体而弯曲线条。唐兰《中国文字学》指出：“凡是象形字，虽则都是原始字，可是它们的发生时代不会一样，兜和象的图画，也许两万年以前就有了，‘从’字象旗形、‘鼎’字象鼎形，就一定要文化较高的时候才发生，那就晚得多了。”

⑤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其字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义而形之；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不言义者，不待言也。……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段玉裁谓形声字“半主义半主声”的说法得到后世学者的认可，然而“主声”的那一半就不“主义”吗？这个问题的讨论参见拙著《汉字学十讲》（学林出版社 2006）。《说文解字》中还有多形多声的分析，如“竊”字《说文解字》分析为二形二声，“讙”字一形二声，“碧”字二形一声，“彘”字三形一声，“寶”字三形一声。实际上，“竊”字义符为穴，其余为声符；“讙”字义符为圭，其余为声符；“碧”字义符为石，其余为声符；“彘”字是个会意字，从豕从矢；“寶”字义符为寶，缶为声符。

⑥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指撝与指麾同，谓所指向也。比合‘人’‘言’之谊，可以见必是信字；比合‘戈’‘止’之谊，可以见比是武字，是会意也。会意者，合谊之谓也。”“止戈为武”与“人言为信”见于《左传》，然而这不是武、信二字成为会意字的理由。武字所从之“止”并非停止的止，而是脚趾的趾（初文作止）。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谓信字“使人传言，故从人言会意”。

⑦ “转注”一书自许慎以降，诸家各执一说，莫成定论。后世学者把诸说分为形转、声转、义转三派。形转之弊不必多说，声转、义转都涉及意思相同的问题。然许慎定义中的“同意”果真是“同义”的意思吗？稍作考辨就可以得到否定的回答。详论见拙著《汉字学十讲》。

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①。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②。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③。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④。分为七国，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⑤。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⑥。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⑦。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

① “六书”之“假借”与古汉语中所说的“通假”绝非一事。字形与字义无联系的才是假借，如舍弃的“舍”，从字形上看，它所表示的字义是房舍。如果这个“舍”只表示舍弃的意思（这等于是字义消失），那么它就是个假借字。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两个舍字：一个是房舍的“舍”，字形与字义吻合。另一个是舍弃的“舍”，字形与它所表示的意义无联系。许慎这里举的“令”“长”的例子，后世学者多认为属于词义引申。许书正文没有出现“假借”一词，这是不是意味着许书无假借呢？解释字义注重文字的形义联系，析形往往与释义相合。所以从理论上讲，许书正文不会出现假借的分析。但对于9353个汉字进行解释，难免会有漏洞。如《手部》：“揆，葵也。从手癸聲。”从手的“揆”跟葵菜的“葵”好像意思不同，那么许书的这个条目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从《诗·小雅·采菽》：“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中的“葵”是假借字，本字当作“揆”。《尔雅·释言》收录作：“葵，揆也。”

② 周宣王名静，于公元前827年至公元前782年在位。太史，官名。籀，人名。《汉书·艺文志》录有《史籀》十五篇，谓《史籀篇》乃“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子壁中古文异体”。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说：“《史籀》文字传自西周，实西周古文；孔壁古文写于东周，实东周古文。”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此处作“与古文或同或异”。籀文为西土文字，古文为东土文字。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古文、大篆二者错见，此云皆以古文，兼大篆言之。六经、《左传》不必有古文而无籀文也。下文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兼古文言之，不必所省改皆大篆而无古文也。秦书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不言古文，知古文已包于大篆中也。王莽改定古文有六书，一曰古文，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三曰篆书（即小篆）。不言大篆，知古文、奇字二者内已包大篆也。《吕氏春秋》云：‘仓颉造大篆。’是古文亦可称大篆之证。”“古文”这个名称与“今文”相对，是指汉代的古文经传。王国维《汉代古文考》说《说文》“全书中所有重文、古文五百字许，皆出壁中书及张苍所献《春秋左氏传》，其在正字中者亦然”。后世有“六国古文”之称，是指除秦以外的分别以齐楚燕韩赵魏为中心的战国文字。籀文一般指大篆，为秦系文字。王筠《说文句读》：“厥意指字义而言，孔子、左氏既用古文，字义自然可说。”

④ 诸侯力政，即战国时期崇尚武力，舍弃礼乐。政，通征，谓征伐。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周游列国，以期恢复礼乐，收效甚微。

⑤ 七国指战国时代较强的诸侯国，分别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诸侯国各自为政，不遵周制，以至“田畴异晦，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畴，田也。晦，今作亩。涂，今作途。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七国时，车不依辙广八尺之定制，或广或狭焉。涂不依诸侯经涂七轨、环涂五轨、野涂三轨之制，各以意为之，故曰车涂异轨也。”至于“言语异声”，原本属于方言的问题，历来存在。“文字异形”现象参见何琳仪先生的《战国文字通论》。

⑥ 秦代“书同文”不仅“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废除区域性异体字，还系统地对秦国传统文字作了简化，即“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形成小篆，通行天下。

⑦ 秦国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改《史籀》大篆为小篆，作《仓颉篇》，中车府令（官名，主乘舆路车）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复姓胡毋）作《博学篇》。汉代初年，上述三部字书合称为《仓颉篇》，又称“三仓”，共收录3300字。《仓颉篇》四字一句，每两句用韵，便于记诵，是教学童识字的字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省者，减其繁重；改者，改其怪奇。如民、弟、革、酉，皆象古文之形，所谓改也。书中载秦刻石‘廿’‘汝’二字，此又刻石与其小篆异者，如古文之有奇字也。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者，言《史籀》大篆则古文在其中。大篆既或改古文，小篆复或改古文大篆。或之云者，不尽省改也。不改者多，则许所列小篆，固皆古文大篆。其不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古籀同小篆也。其既出小篆，又云古文作某、籀文作某者，则所谓或颇省改者也。”简言之，就是省减大篆繁复的构形，改定古文因象形而“随体诘诎”的笔势。